

汪荣祖 著

晚清变法思想论丛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汪荣祖 著

晚清变法思想论丛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晚清变法思想论丛 / 汪荣祖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8.2

ISBN 978-7-80225-407-7

I. 晚... II. 汪... III. 思想史—研究—中国—清后期

IV. B250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2748 号

晚清变法思想论丛

汪荣祖 / 著

责任编辑: 许 彬

装帧设计: 林 涛 秦 崑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65512133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 刷: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开 本: 960 × 1300 1/32

印 张: 6.625 字 数: 109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2 月第一版 2008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0 001~5 000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407-7

定 价: 21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大陆版新序

《晚清变法思想论丛》一书初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于1983年出版,距今已有二十四年。回顾此书出版以来,我对相关课题继续作了不少研究,也写了些中英文文章。有关康有为的研究,先写成专书《康章合论》,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于1988年出版,之后又写了一系列有关康有为的论文,包括《康有为早年思想析论》,载《汉学研究》12卷2期(1994年12月)页51—62;《翻案与修正之辨:再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答黄彰健先生》,载《汉学研究》11卷2期(1993年12月)页383—390;《康有为天游志趣发微》,载台湾《政治大学历史学报》15期(1998年5月)页29—38;《康有为保皇的意义》,载《国立暨南大学学报》2卷1期(1998年3月)页1—12;《打开洪水的闸门:康有为戊戌变法的学术基础及其影响》,载《二十世纪》45期(1998年2月)页27—38;《也论戊戌前后的康有为》,载《历史研究》258期(1999年4月)页72—87。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写成《康有为》一书,收入傅伟勋与韦政通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,

由台北东大出版社于 1998 年出版,于 2006 年收入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“汪荣祖人物书系”时,易名为《康有为论》。

有关王韬的文字有《王韬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》,刊载于林启彦与黄文江合编的《王韬与近代世界》,由香港教育图书公司于 2000 年出版,页 35—42。严复也是晚清的重要思想家,尤其在翻译方面,名重一时,我曾发表《严复的翻译》一文于《中国文化》第 9 期(1994 年 2 月)页 117—123 以及《重读严复的翻译》,发表于《传记文学》524 期(2006 年 1 月)页 4—24。《严复新论》一文收入林起彦主编的《严复思想新论》一书,于 2000 年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,页 17—24。后来又写了《三人连环叙:郭嵩焘、严复、曾纪泽》一文,收入汤一介主编的《国故新知: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》,于 1993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,页 408—414。1988 年正值戊戌变法九十年,台湾大学举办国际学术会议,我提交了《戊戌变法九十年:研究成果的回顾》一文,后收入《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》,由台湾大学出版社于 1992 年出版,页 779—802。以上部分文字收入《从传统中求变:晚清思想史研究》一书,由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于 2002 年出版。

由英文发表的论文有“The Significance of the Kuang Hsu Emperor to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”(“光绪皇帝与戊戌变法”), in *Transition and Permanence: Chinese*

History and Culture,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Dr. Hsiao Kung ch'uan (《萧公权博士荣退论文集》), David C. Buxbaum and Frederick W. Mote ed., (Hongkong: Cathay Press, 1972), pp. 169 - 186; "Feng Kuei-fen's Perception of Reform, 1809 - 1874 (冯桂芬的变法观)," *Monumenta Serica, 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* (《华裔学志》), Vol. 31 (1975), pp. 131 - 150. "The Ideal of Universality in Late Ch'ing Reformism (晚清变法思想中的大同理想)," in *Reform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* (《十九世纪的中国变法》), edited by Paul A. Cohen and John Shrecker 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76), pp. 150 - 159, 356 - 360 (footnotes); "Paul A. Cohen's Study of *Wang T'ao: A Critical Review*" (《评柯保安论王韬》), in *Monumenta Serica*, Vol. 31, (1975), pp. 618 - 222. "Universalistic and Pluralistic Views of Human Culture: K'ang Yu-wei and Chang Ping-lin (康章不同的文化观)," *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* (《远东史学报》), No. 41 (Mar. 1990), pp. 97 - 108; "Revisionism Reconsidered: Kang Youwei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" (《驳翻案: 康有为与戊戌变法》), in *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 (《亚洲学报》), Vol. 51, No. 3 (Aug. 1992), pp. 513 - 544. "Philosophical

Hermeneutics and Political Reform: A Study of Kang Youwei's Use of Gongyang Confucianism”(《哲学诠释与政治改革：康有为与公羊学》)，in Ching-I Tu ed., *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: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* (经典与解释：中国文化里的诠释传统)，(New Brunswick & London: Transaction Publishers, 2000), pp. 383 - 407。《晚清变法思想论丛》原序中曾提到，英文论文将由当时台北专营洋书的敦煌书局结集出版，后因敦煌易主而作罢，另由纽约彼得蓝出版社发行，书名 *Rejuvenating a Tradition: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* (《传统之再生》)，收入 *Asian Thought and Culture Series* (《亚洲思想文化丛书》) No. 3 (New York, Bern, Frankfurt, Paris: Peter Lang, 1990)。以上为作者二十余年来继《论丛》诸篇的后续成果，谨向读者报告。

论丛原由五篇相关文章组成，脚注引文范式颇不一致，今特编成全书的“引用书目”，附于书后，详列作者、书名、版本，以及出版时间，以备读者按目索骥，脚注则仅列作者、书名，以及所引书目页数。今旧书新印，内容未加增删，以维持当年的原貌。

汪荣祖

2007年11月12日于台北之东湖

原 序

十余年来，颇事晚清变法思想之研讨，著有中英文字多篇。前年在台，承敦煌书局之好意，集英文各章为一辑，曰 *Remodelling A Tradition: Studies in Late Ch'ing Reform Thought*，即将付梓。今复承联经出版公司之嘱，合中文诸篇为一册。敝帚自珍，不值博雅君子一笑。苟能便于学者展阅，或可略减枉费纸墨之罪。

此册所收五文，皆曾先后发表于诸学报。今兹重印，除修饰矫正文字外，内容如旧。编辑校读之际承吾妻陆善仪女士之助良多，贤内嘉惠，并志简端。

汪荣祖 1981年5月

目 录

大陆版新序	1
原序	1
晚清变法思想析论	1
论晚清变法思想之渊源与发展	57
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	94
王韬变法思想论纲	130
论胡礼垣的大同思想	171
引用书目	189

晚清变法思想析论

一 引言

晚清有三大运动，即自强运动、变法运动与革命运动。三者皆有其独特之思想背景。从历史发展上观察，自强思想发生最早，继之以变法思想，再继之以革命思想。从思想发展上观察，三种思想虽继往开来，但在新旧交替之时，新思想常发生于旧思想未尽褪色之前，如在咸同之际，自强运动正蓬勃兴隆，然变法思想已育其胎；又当光绪季世、甲午之后，变法思想经三十年的激荡，已成风潮，卒有戊戌变法之一幕，但正当此时，革命思想与行动亦已见端倪。及至清室最后十年，保皇与革

命二党虽势如水火,但变法与革命两思想因子,其间相互错综复杂之关系,学者已多论及^①。由于思想演变之迹并不十分明晰,于是以变法派为自强派者有之,以变法派为革命党者亦有之,殊不知思潮如江河,虽或有夺他流入海者,但一般言之,泾渭分明,不能以江为河。是篇之作,拟就变法思想之内容作全面的观察,分析其独特之思想因子。诸思想因子之结合,乃成变法思想之实质。借以显示变法思想之特点,以别于自强思想与革命思想。

二 二个核心——变通思想与缓进思想

倡议变法,旨求变通,殆无可疑。此一思想因子在晚清并非新出,国史上颇有成例。最有名者为商鞅变法与王安石变法,二者皆以求富强为求变的动力。不过,前者求富强以与列国争,而后者求富强以御敌国之威胁。晚清变法思想亦以富强为动机,然其目的不仅仅是御敌,亦不仅仅是与列国争,同时要应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此未有之变局乃由于鸦片战后门户洞开,策应无方,明达之士,忧心

^① 参看丁冰峰,《清末君宪与革命之论争》;Michael Gasster, *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*。后书台北有虹桥翻印本。

忡忡,不知所措,唯有惊叹。然从历史背景看,此巨变之起,实由于中国突自帝国之世界进入列国之世界。按西洋列国的形成,自罗马帝国崩溃之后,经千余年逐渐蜕变而成,其势自然。但中华帝国经外力之压迫,猝然降为列国之一员,其势仓促,当之者其心情之惊惶失措,亦意料中事。有此一历史巨变,乃有反映此变的不同思想。倡导变法论者即欲以变求通,使中国成为一富强之近代国家,以摆脱内乱外患的危机。

然而变法一词虽旧,晚清变法的内容实新;变通思想虽自古有之,变通的实效自古难得。故晚清变法家目击历史巨变,处惶恐之世,编织其思想内容时,如何说服朝野人士应变,最称急务,亦是一代思想家所面临之重大课题。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接触之际,或自觉,或无觉,每有抵制之倾向,何况中国文化遭外来文化之挑战,其反抗性更为强烈。加之,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辄以保守为尚,弃旧换新,每多迟疑。凡此皆为采纳新思想内容之障碍,故变法家欲变当时之法之前,必先批判保守之积习,翦除迟疑不前之心情。尤有进者,对当时之思想界,尤不得不论证变通之合理与必要。

变通何以合理?何以必要?王韬曾谓国史即一变动之发展史,孔子亦圣之时者,若孔圣处今之世,亦

必应变^①。是则，王韬以快刀斩乱麻之手法，判定中国历史文化原本变化不息，今日求变乃极自然。

论证变通思想最可引用之传统经典，当属《周易》。穷则变，变则通，人皆知之；何况易言玄秘，古来中国思想家多受其启发，然每有不同之结论^②，譬照铜镜，人人可以己影为形，晚清变法家自难免不以《周易》为据，求变求通。《周易》中之词汇，如变通、如天道、如沿革、如道器、如自强，乃时见于变法文献之中。例如王韬于“变法”一文中，开宗明义，即引“穷则变，变则通”一语，演绎其说，他对西力东渐与中国变局之间的关系，洞若观火，故谓利玛窦之东来已兆中国近代巨变之先机^③。先机虽早露，唯恒人不易觉察而已。他又用“天心”一词，颇似《周易》中之天道，王弼释易曰唯圣人能先知天道之变^④，而王韬则曰唯有少数有识见之士，才能洞悉天心的趋向，识见之士何在？王韬未曾明言，但似指晚清变法家，故其本人亦义不容辞，指

① 见王韬，《弢园文录外编》，卷1，页10（下引此书简作《弢园文录外编》）。

② 根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研究《易经》之书有317种。近人严灵峰收辑到352种，见《易经集成》。另参看钱基博，《经学通志》，页12—13；汤用彤，《魏晋玄学论稿》；李光第，《周易折衷》（1716），此书论述周易对宋儒之影响。天主教士研究周易之书，至少可得两种：《周易原质谈》、与《琐言分类》，皆藏梵蒂冈天主教图书馆，见徐宗哲，《明清耶稣会士遗著提要》，页134。

③ 以易为镜见王夫之，《周易内传》，载《船山遗书》（1866），卷1，页14—15；《弢园文录外编》，卷1，页12。

④ 王弼，《周易注》，卷5，页5。

出天心之所趋向^①。

又如严复之《天演论》。此书虽译自英人斯宾塞(Herbert Spencer)的《演进与伦理》(*Evolution and Ethics*),然经严氏典雅之笔意译之后,中国学者读来不啻是一释易之新作^②。事实上,严复以“演进”为“易”而释之,所释之易,就内容实质而言,无疑是19世纪西欧思潮之缩影,他以“逻辑”(logic)为“名”,以“数学”(mathematics)为“数”,以“物质”(matter)为“质”,以“动力”(force)为“力”。是以,易书上所谓名数为纬,质力为经,亦即西洋数理之四概念。而斯宾塞所谓由简易到复杂之演进,亦即是易书上所谓:“坤静而巽,坤动而辟”^③。于是,严复用西方学说,以易理演绎,说明变通思想乃中外之通理,亦为人类社会文化进

① 《驳园文录外编》,卷1,页10,卷5,页18;卷2,页18、19、25。康有为也有近似之议论,见康有为,《孔子改制考》,卷8,页2。

② 见钱基博,《经学通志》,页38。

③ 严复,《严幾道文钞》,页208。不过,严氏这种中西思想比较,在当时并非独一无二的,参看杭辛斋对易之解释,认为民主与科学皆在其中,见钱基博,《经学通志》,页39—40。近人吴森教授作易经与杜威哲学之比较,发现就形而上学而论,至少有二个共通之点,见Joseph S. Wu, "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: Confucianism and Pragmatism", in *Philosophy, East and West*, 23: 3 (July, 1973), pp. 323—332。牟复礼(F. W. Mote)教授更进而探讨中西文化之“观念距离”,见F. W. Mote, "The Cosmological Gulf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", in *Transition and Permanence*, eds. by David Buxbaum and F. W. Mote (Hong Kong, The Cathay Press, 1972), pp. 3—17。晚清变法家固未注意此种“观念距离”,盖易学研究非彼辈注意之重点也。

展之不可避免者。

晚清变法家用传统思想模式，古典词汇来说明新说，事属自然，因彼辈原是受传统教育之知识分子；而且亦有必要，因非如此新说便难以渗透旧思想界，如传教士撰写的俚俗之作，便不能在当时的思想界推波助澜。用旧模式、旧词汇来解说新的变通之理，《周易》当然是最丰富的知识宝库。但是，晚清变法志士并不为《周易》所限。例如，他们并不以《周易》之定命论，或天命观为然，而着重“尽人事”。换言之，人事而非天命乃是人类命运之主宰^①。求变通亦即是在尽人事。

不过，晚清变法家并未尽弃天命观；他们以天命为人心以及历史趋向之反映。易辞言之，观察天命亦就是观察历史与人心，冀有所警惕^②。按诸晚清之历史与人心，天命示变对变法人士而言，岂非太明显了吗？若天命示变，而不尽人事，则听天由命，祸福无主。既尽人事，必须全力以赴以应变，此即康有为其变法奏议中，所强调的“刚断”，他要光绪皇帝学日本明治、俄国彼得，以帝王之大力来扭转乾坤^③。

① 《易经》之天命观可参看 R. G. H. Siu, *The Portable Dragon*, p. 158.

② 王韬对普法战争之看法，最可见其天命人心之说，见《弢园文录外编》，卷8，页12—14。并参考王韬，《普法战纪》，卷1886。

③ 康有为，《戊戌奏稿》（1900），页1。

然而,尽人事需有引导。晚清变法家以历史为最佳之指针。固然,中国自古以史为镜,但真能为今日人事导向之作,实在不多,此点郭嵩焘言之最明。他以为有用之史著,唯属史论,故传统之良史唯刘知幾与王夫之,庶几近之^①。郭又由史通变,以为时间屡变,政制社会当随之变易以应时^②。郭氏尝有意撰元明史论,续船山《宋论》,作为时变之参考,惜书未成^③。

又变通不仅是历史文化进展之必然,且有实用的价值,盖变通可以纠谬。汤震(寿潜)有言,凡制度皆由简而繁(此点似受严复译著之影响),而“繁”必生谬误,时时变通则可时时避免谬误^④。陈虬亦云,法度能维持秩序,必要之变通可使法度常具效力^⑤。伸言之,欲使法度不毁,唯有变通。盖变通可令旧法度适应新环境。此正晚清变法家所寻求之目标。

晚清变法论中之变通思想已如上述,但此一思想中尚有一“不变”之因子,有待解说。“不变”或亦来自《周易》,

① 郭嵩焘,《养知书屋诗文集》(台北,文海重印),册1,页217;册3,页1393。

② 郭嵩焘,《礼记质疑》(1873),卷1,页2—3;卷10,页3。并参看郭廷以等编,《郭嵩焘先生年谱》,册1,页471—473。

③ 郭嵩焘,《养知书屋诗文集》,册1,页217;册3,页1393。

④ 汤震,《危言》(1897),卷4,页28。

⑤ 陈虬,《治平通议序》,《瓯风》,期9(1934,9月),页1。参看翦伯赞等编,《戊戌变法》,册1,页218。张之洞有同样之议论,见张之洞,《劝学篇》(武昌,两湖书院,1898),页18—22。

皮锡瑞曾指出,“变”与“不变”为易之二大概念^①。盖易之作者,处太古之世、观察万象变化,觉察到不变之事实,如自然之位置(天上地下)以及秩序(非时序),皆永恒不变。再由自然观察到人文,发现人事常变迁而人伦不变,如父子之关系古今中外不变,此即所谓:“天不变,道亦不变。”*

是以变通思想包涵“变”与“不变”二因子。晚清持变法论者对此颇有发挥,可见之于道器、体用、本末诸说。近人常将道器分割,实则道器非二元,乃一元之两面。朱熹言理器已阐明此理^②。章学诚言之尤明,谓道器之不可分犹如影之与形^③。晚清学者对此并无新义,持变法论者亦如是,故郑观应说:道无器,道不能发生作用;器无道,器亦不能表现性能^④。

若将道比作道德或精神因素;器比作科技或物质因素,精神物质两因素显然不能分割。晚清变法家深信中国精神文明不亚于西方,但都承认物质文明之远不如。然而何以合一之两因素,不能均衡发展? 对此一问题之解答,

① 皮锡瑞,《经学通论》,页1—2。

* 近读钱锺书《管锥编》册1(北京,中华书局,1979)论易部分也涉及“不变”,甚是精湛,读者可以参阅。

② 朱熹,《朱子文集》,页58。

③ 章学诚,《文史通义》,页26。

④ 郑观应,《盛世危言》,册1,页47。